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黄宇和

### 一 导 言

孙中山尝言：“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交结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sup>1</sup>

三民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占相当重要地位。首先，孙中山提倡的民族主义，在1920年代国共合作时期被大力宣传下，凝聚了澎湃的爱国情绪，发挥了无穷力量。北伐战争，就是在这种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之下，发动并统一中国的。<sup>2</sup>尽管1927年后国共分家，但是有学者认为，此后中共所作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复杂的民族主义理论系统当中一种特殊表现。<sup>3</sup>更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推动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发展。<sup>4</sup>已故的费正清教授曾经说过，“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与实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况必须搞清楚”。<sup>5</sup>无可否认，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这种现象，发轫于孙文学说。其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也在近代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过不同的作用。因此，探索孙中山“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sup>6</sup>是一个甚有意义的课题。但是，孙中山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日记、游记，甚至简单的笔记。谁知道他见过什么、闻过什么？更遑论探索他心里想什么及如何完成其三民主义的腹稿。这问题是多年以来困扰着史学界的焦点之一。这个难题是否永远没法解决？

近世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sup>7</sup>

陈寅恪先生的话，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陈先生的话，可以理解为：“对古人之立说”，是可以达到“真了解”的境界的。而途径有二。第一，必须“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第二，必须“神游冥想”，以便明了其“持论之苦心孤诣”。关于第一点的妙用，则太史公司马迁早已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至于第二点，即“神游冥想”的重要性，则牛津大学前皇家近代史教授（Re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核·特瓦若袖（Hugh Trevor-Roper）说得更直接了当。他说：“没有想像力的人不配治史。”<sup>8</sup>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古代史的专家；特瓦若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柏教授是欧洲近代史的专家。可见，无论是古今或是中外的历史，如果要对它达到“真了解”的境界，“神游冥想”是不容或缺的阶段。

从研究近代史人物之如孙中山及其思想来源的角度来说，上述两个途径，在具体实践起来时，如何走法？窃以为如果要达到“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则最好是亲临孙中山活动过的地方，体验生活，观察环境，浸淫于接近当时的实际条件当中。再结合文物、文献等，重建当时的各个历史细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神游冥想”，把各个表面上似乎毫无关连的细节，像积木那样，重新架构起来。所以，在过去的24个寒暑当中，笔者每年都必定重访伦敦一趟到两趟。每趟都一步一脚印地、三番四次地、“跟踪”孙中山走过的地方。在伦敦市区内“跟踪”孙中山，则无论多远，笔者都是靠两条腿和一部自行车。市区以外的、当年孙中山也要坐火车的，笔者也坐火车。每一次“跟踪”后所得到的感受，都与前一次不一样：是一次比一次深刻了。可以说，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发展，感受与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与日俱增。重新架构起来的“积木”，越来越比较像样了。学问功夫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信焉。

接着，在这个“积木”的基础上，结合孙中山后来见诸文字的理论和行动，作“神游冥想”，探索其三民主义思想的渊源，也越来越多了点滴信心。

下面比较具体地谈谈，在实践过程中，笔者对上述三个途径——即实地考察、文献钻研和神游冥想——的体会。

## 二 实地考察

就以孙中山伦敦蒙难这件事情为例吧。孙中山最初以为必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死无疑。后来竟然又能逃出鬼门关。这种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验，对他的人生观以至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会有什么影响？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必须搞清楚他被幽禁的整个过程。而弄清幽禁过程的第一步，又必须查清楚他是如何被绑架的。伦敦这么大，又人海茫茫。为什么孙中山在到达伦敦的第12天早上，就在公使馆的正门被绑架进入公使馆？孙中山别的地方不走，为什么偏偏就要走过公使馆的正门？公使馆的人员，从何得知他们要绑架的这个人，就是孙中山？不错，公使馆是雇了一家名叫史雷特的私家侦探社，让该社派人跟踪孙中山。但是侦探的报告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线索。正如罗家伦教授很早以前已发现的，当孙中山被幽禁在公使馆后，那饭桶侦探还坚称孙中山一直足不出户地留在旅寓睡大觉！<sup>9</sup>

孙中山为什么偏偏就要走过公使馆的正门？如果我们亲临其地，沿着孙中山走过的地方，一步一脚印地“跟踪”他；再结合文献记载，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就很有帮助。孙中山到达伦敦当天，已是深夜，入住旅馆后，就没有再外出活动。第二天早上，他去探望恩师康德黎医生。<sup>10</sup>他从旅馆到康家是怎么走的？笔者经过实地考察、比较各种交通工具和路线等，判断出孙中山是徒步去的。<sup>11</sup>而徒步到康家，则必须由南往北走地经过公使馆的正门。<sup>12</sup>正门旁边有两道很大的窗户，通过这两道大窗，可以看到街上的行人。

同时，该公使馆位在钵兰大街（Portland Place）与媯密夫街（Weymouth Street）交界的西北角。而公使馆向南的侧面，即面向媯密夫街这一方向的那部分，每一层都有窗户，让公使馆里边的人，有很长的时间，细心观察由南到北、横过媯密夫街的行人。而且，公使馆每层楼都有三道窗户、向着媯密夫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街，五层共 15 道窗户。<sup>13</sup>当孙中山沿钵兰大街西边、由南往北走而横过媿密夫街时，公使馆里的众多人员当中，只要其中有一位从 15 道窗户当中的一道窗户往外望，就会看到孙中山。为什么孙中山要在钵兰大街的西边走？因为，接着走到下一个街口再往西拐，就是康德黎医生的寓所。如果孙中山早知道公使馆的准确位置，他可能会绕道而行。但当时他并不知道。

最后，公使馆的华籍员工似乎有个习惯：他们爱在附近逛街。早在第一任公使郭嵩焘的时代，就有该公使馆的华籍员工，因逛街而闹出事来。<sup>14</sup>这也难怪，当时的英国与清统治下的神州，分别是这么大！任何稍具好奇心的人，都会经常到街上逛逛。孙中山只要在街头遇上公使馆众多华籍员工中任何一位，都会引起怀疑。因为，当时的钵兰大街，极少华人涉足。其实，整个伦敦，当时也极少华人。有么也多数在东伦敦部的码头区当工人。孙中山的突然出现，肯定马上引起怀疑。

当孙中山到达伦敦第二天（1896 年 10 月 1 日）的早上，第一次由南往北走过公使馆正门时，公使馆的人是否已注意到他？我们不知道。当天稍后，康德黎医生带着他，前往康德黎自己过去当大学生时寄居过的格雷法学院坊，为他找廉宜寓所。<sup>15</sup>经笔者实地考察，他们所走的路线，也必须从北往南地经过公使馆大门。这是孙中山第二次在鬼门关<sup>16</sup>外晃来晃去。

1896 年 10 月 4 日星期天，孙中山早上再访康家，<sup>17</sup>第三次走过公使馆正门。过了一会，孙中山跟康家大小一道走路上礼拜堂。康家有固定的礼拜堂，那就是圣马丁教堂。<sup>18</sup>经考证，该教堂位于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的东北角，从康家走路去不远。但必须路过公使馆的正门。如果是坐马车去，还没什么。但是如果徒步去，则一个东方人，在一家洋人当

## 三 民主义伦敦探源

中，还有两三个小孩蹦蹦跳跳地，<sup>19</sup>走过公使馆正门，怎不引起里边的人注意？经笔者考证，当时他们是徒步去的！承康德黎医生的幼子<sup>20</sup>肯讷夫·康德黎上校（Colonel Kenneth Cantlie）相告，他爸爸从来没拥有过一部私人的马车。如果不是有急事或目的地太远，无论到伦敦任何别的地方都是走路，很少坐出租马车。他的外婆，住在伦敦西南部的班斯区（Barnes），走路去，单程得走上五六个小时。但是，他妈妈经常都带着保姆、领着孩子们走路去的。星期六去，星期天回来。圣马丁教堂近在咫尺，他肯定上教堂时，是走路去的。<sup>21</sup>

在教堂守过礼拜以后，于回家路上，又是这么一个东方人，亲亲热热地走在一家洋人当中，更有两三个小孩蹦蹦跳跳地，走过公使馆正门，里边的人还看了没有？

在康家吃过午餐，畅谈过后，孙中山在回家途中，第六次走过公使馆正门。但这次是单形只影者，公使馆的人，注意了没有？

1896年10月6日星期二，孙中山再访康家。上午去，下午回。<sup>22</sup>去时第七次走过公使馆正门。回时第八次走过公使馆正门。翻查公使馆档案，公使馆在当天下午15:00时，就给史雷特私家侦探社发了一封电报，要求该社暗中偷拍孙中山一张照片。难道这是偶然的？公使馆的目的很明显。如果侦探成功地偷拍了该侦探所跟踪的目标的照片，就可以用来对照一下。这样可以证实，这个从10月1日起突然出现的、此后不断在公使馆面前摇来晃去的陌生人，是否就是前一天（9月30日），在该侦探监视下、于利物浦登岸的孙文。因为，侦探社发给公使馆的、有关孙中山行踪的报告中，绝口没提到过该目标曾走近公使馆，也没有提到他曾多次探访康家！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可惜，那侦探社回答说：“待天气好转再说吧。”<sup>23</sup>就是不爱想办法。公使馆没奈何。只好干焦急。接着，孙中山应邀到恩师孟生医生（Dr Patrick Manson）家里晚餐；日期，据孟生医生回忆说，要么是1896年10月8日星期四，要么是1896年10月9日星期五。<sup>24</sup>经实地考察，孟家也非常靠近公使馆，与公使馆和康家大约成品字形。公使馆的人，今天又注意了他没有？1896年10月10日星期六，孙中山再访康家。<sup>25</sup>让我们可以肯定他第九、第十次走过公使馆正门。其他不能肯定的次数不算。

1896年10月11日星期天清早，当孙中山正要作第十一次（我们能肯定的）路过公使馆正门时，公使馆里的人终于采取行动，把他诱骗进去。重建当时公使馆人员的心思与布局，是很有趣味的。第一，钵兰大街是使馆区，星期天使馆人员不办公，行人极少。尽管有些居民吧，星期天的早上都睡晚点。清早时分大家还在梦乡，外来客就更少。在这个时候采取行动，最适合不过。上个星期天孙中山来过一趟，与康家大小上礼拜堂。今天会不会再来？第二，如果再来，预先会有什么兆头？承该街一位老居民相告，钵兰大街南端路中心有一座圆形的教堂，两旁所有建筑物的前部都是半圆形，行人从南到北进入钵兰大街，必须绕过该教堂。在绕行的过程，就会发出回响。<sup>26</sup>如果有人站在钵兰大街等候，还未见到来人，早已听到脚步声，好做准备。钵兰大街的星期天清晨，平常是静悄悄的。1896年10月11日的清早，再一次来了脚步声，九成是这个陌生的东方人重现了。

如果没有作实地调查，上述的关键情节，笔者就无法知道并作联想，更无从解决为什么孙中山会遭到绑架的问题。更重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要的是，从探索三民主义渊源的角度来看，则跟踪了孙中山10天，收获同样丰富。光以孙中山在伦敦活动的第一天（1896年10月1日）为例，就发人深省。正如前述，当天早上，他徒步往访康德黎医生。通过实地考察，笔者发觉，他沿途见到的，是英国建筑业辉煌的成就。甚至可以说是无与伦比，是大英帝国鼎盛的象征（见第三章“图篆”）。日不落帝国，称霸全球，到处欺负弱小民族。这些雄伟建筑，部分是被剥削民族的血汗。当时的中华民族，就是被踩在地下的民族之一。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心弦，有没有被扣住？通过实地考察，又发觉当天康德黎为孙中山找到的旅寓，位置就在格雷法学院的边上，日后孙中山多次跑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叫“南院5号”的，其实就是到该法学院去，与一位念法律的英国学生讨论问题（见第二章“日志”）。讨论什么问题？民权的问题？由于实地考察，又发现当天黄昏，孙中山参观了伦敦大学著名的英王书院（见第三章“图篆”）。教育与民生息息相关。当时的神州大地，还没有一所现代的高等学府。

若嫌参观大学的例子还不够直接了当地显示出它与民生的关系，则第二天，孙中山在霍尔本区（Holborn）活动。该区既有辉煌的格雷法学院，也有查里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描述的贫民窟（见第三章“图篆”中的5月部分）。孙中山见了没有？第三天，他跑到老远的水晶宫（Crystal Palace），花了一整天参观由英国皇家园艺协会（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所举办的全国水果展览（见本章第七节“本书脉络”）。第四天（1896年10月4日星期天），同样通过实地考察，笔者发觉，孙中山与康德黎一家步出教堂时，目睹英国罢工工人示威的盛大、动人场面（见本章第五节“神游冥想”）。这全都与民生有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关（后者当然与民权也有密切关系）。

在短短的四天之内，有关三民主义的例子，就通过实地考察，排山倒海而来。

关于实地考察对三民主义探源的关键性，让笔者再举一个例子。侦探报告说，孙中山逃出后，即在“查灵十字的税氏酒肆接受记者采访”。<sup>27</sup>这不是一般的记者会，而是轰动世界的“宣言”。这“宣言”，让孙中山从一个落荒而逃的反叛者，摇身一变而成为“当世大英雄”（the hero of the great generation of the day）。<sup>28</sup>它把孙中山推上世界性的政治舞台，充实了他的使命感。而作为一位世界性的政治人物，不能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光有行动，没有理论，是不能领导革命成功的。对孙中山来说，这是一种崭新的体会。他本来打算在英国逗留 10 天左右，就赴法国，<sup>29</sup>继续其环球旅行。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决定暂时留在英国多多学习，终于“完成”了他的三民主义。<sup>30</sup>他之所以改变主意，很可能就是因为有了上述那种崭新的体会。因此，发掘当时他谈话的内容固然要紧（笔者觅到了，见第四章），但是找出记者会举行的地方——税氏酒肆——的具体方位，考察它的外型，研究它的内部布置，则同样为重要。因为，以孙中山当时的政治素养来说，作没有准备的仓促谈话，不可能谈出什么政治理论。倒是他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人生第一次地面对甚有学问的记者轮番发问时，深刻地体会到有政治主张的必要，尽管当时他在这方面不多说（见本书第四章）。

但是，税氏酒肆在哪儿？现代伦敦的街道图，却没有查灵十字，只有查灵十字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现代的伦敦电话簿根本没列上“税氏酒肆”这名字（侦探报告所用的具体地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名字是 Shades Public House)。<sup>31</sup>1979—1980 年度，笔者休假整整一年，在伦敦做研究，沿查灵十字路反反复复地走了不知多少遍，都属徒劳。

后承英国大律师协会的唐林先生 (Mr A. J. Tomlin) 相告，《伦敦邮政便览》(Kelly's London Post Office Directory) 可供参考。<sup>32</sup>笔者追查该《便览》，则证实 1896 年的伦敦，的确有查灵十字这个地方。而税氏酒肆就位于查灵十字 27—28 号。<sup>33</sup>因此，1983 年 5 月，笔者兴冲冲地又跑回伦敦，在《便览》提及的地区内，即河滨路 (Strand) 与白厅 (Whitehall) 大街之间，<sup>34</sup>把每条街道、每家招牌都仔细看个遍，仍不得要领。但是，有了一点头绪：在该区内某栋高大房子的墙壁上，钉了一道牌子“查灵十字”。这牌子虽然与现代街道图相悖，但证明地区是找对了。

后来，探得英国皇家建筑设计师协会 (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珍藏有税氏酒肆的铭刻铜片 (copper engraving)。<sup>35</sup>于是修书求助。承其提供了该铭刻铜片的照片，如获至宝。<sup>36</sup>于是，1987 年 1 月，又兴冲冲地再飞伦敦，并把搜索范围扩大到白厅。从北往南地，在白厅的东边慢慢走。一边走，一边把马路对面、即白厅大街西边的建筑物，一座一座地与手中的图片比较。走到白厅大街南端尽头，立即横过马路。再从南到北地在白厅大街西边慢慢走。一边走，一边把马路对面、即白厅大街东边的建筑物，一座一座地与手中的图片比较。在快接近特拉法加广场时，对面呈现的一座建筑物，与手中图片雷同！该建筑物挂有一道招牌：“古老税氏加灵顿” (Old Shades Charrington)。名字虽有增加，但仍保留了税氏二字。<sup>37</sup>正由于它加了“古老” (Old) 二字在前面，难怪在现代的电话部中的 S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部分找不到 Shades (税氏)!

怎么税氏酒肆从查灵十字跑到白厅大街了?很可能白厅大街的北部,过去原叫查灵十字;且看附近就是查灵十字火车总站和查灵十字医院。为了证实这种推想,到大英博物馆查核有关典籍。结果,找到一本书,由伦敦市政厅出版的。其中有一部分,有这个标题:“自1929年8月1日,取消了的街道名称以及其新名字”。查阅之下,证明查灵十字,已改为白厅大街的一部分。<sup>38</sup>这种改动,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同是一条大街,为何南辕北辙呢?接着,笔者迫不及待地函请税氏酒肆的老板,准许笔者前往考察及拍照。多年宿愿,终于得偿!

应该重申,笔者写本文这一节的目标,是要说明:为了解决有关问题,“实地考察”非常有助于我们“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 三 文献钻研

实地考察,脱离不了文献钻研,更代替不了文献钻研。应该说,实地考察与文献钻研,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缺其一。对于这一点,笔者体会是很深的。譬如,侦探报告开头第一天就说,孙中山坐“雄伟”号轮船到达英国,在利物浦的王子码头登岸。<sup>39</sup>这王子码头是怎生模样?这不是一般的问题,因为王子码头所给他的,是他对英国的“第一印象”。而第一印象对一个人的总的观感,有时候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笔者决定亲往考察。在1984年到利物浦,买了利物浦市区的街道图,按图找到王子码头。好荒凉啊!整个海港没有一条远洋船。码头静悄悄的。孙中山当年登岸的情景,肯定不是这样。但当年情景往哪儿找?心中一片茫然。惆怅之余,情不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自禁地在码头区不断地踱方步，直到日落西山而不自觉。突然眼前出现一位中年人，对笔者说：“先生，码头区入夜不安全，我开车送您回旅寓。”<sup>40</sup>

退而求其次，第二天查访所谓 railway omnibus。因为，侦探报告说，孙中山是从利物浦的王子码头坐 railway omnibus，到密德兰火车站（Midland Railway Station）的。<sup>41</sup> Railway omnibus 这个名字好古怪！直译的话，就变成“火车路公共车”。翻阅前人研究成果，则有把它翻译成“公共汽车”者。<sup>42</sup>窃以为这是不准确的。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普遍使用汽油和汽车。笔者在起程前，也曾预先函询利物浦市立档案馆。该馆摸不着头脑，让笔者转向英国的国立火车博物馆（National Railway Museum）查询。<sup>43</sup>笔者照办，同样没有结果。所以，笔者这次亲访，希望多少能找到些头绪。但是，向当地的专家请教，带来的都是莫名奇妙的反应。又是徒劳无功的一天。

第三天，按图欲找密德兰火车站（Midland Railway Station）。因为，侦探报告说，孙中山坐“火车路公共车”到达密德兰火车站后，就从该站乘火车前往伦敦的。<sup>44</sup>但是，找了大半天，就是没有密德兰火车站这个名字。笔者也曾预先函询利物浦市立档案馆和摩斯赛区政府（Merseyside County Council）档案部。前者回信说，密德兰火车站即中央火车站（Central Station）。<sup>45</sup>后者回信说，密德兰火车站即利物浦当今惟一的火车总站——那著名的莱姆街火车总站（Lime Street Station）。<sup>46</sup>孰是孰非，笔者希望通过这次实地考察，能把问题搞清楚。但是，地图上没有密德兰火车站这个名字，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笔者决定下午亲访摩斯赛区政府档案部主任格顿·李德先生（Mr Gordon Read）。翻查 1896 年的利物浦电话簿，证实密德兰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火车站即中央火车站。就匆匆地赶往中央火车站旧址。好荒凉啊！所有大门窗户都用木板钉得死死的，墙壁上的污垢黑压压的，脏得让人作呕。加上时过黄昏，笔者觉得不宜久留，故拍过照后，就赶快离开。这样的照片，怎能反映孙中山当年看到的景象？又是让人失望的一天！

钻研文献去！多次到利物浦向当地的专家请教，承利物浦各档案馆的众多好友不厌其烦地帮忙，通过各种途径，找来当年图片与有关文献，一步一步地解决了不少疑难：当年王子码头的图片找到了！一看，好热闹啊！当年中央火车站的图片找到了，好帅！当年的街景也找到了，好繁华啊！甚至当年孙中山乘坐的那只“雄伟”号轮船的图片也找到了！只有那“火车路公共车”，仍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笔者也不灰心，终于，在1994年3月某天，与同事沃特教授（Dr John O. Ward）闲谈时，承他指引，得阅有关典籍，方知是当年利物浦土话，所指乃有轨马拉车。<sup>47</sup>于是又请利物浦市立档案馆的朋友帮忙，找到有关图片，孙中山当年所处的环境、气氛等等，跃然入目。可见，光靠实地考察而不作文献钻研，是无法重建当年景象的。

### 四 不能以今况古

孙中山从伦敦公使馆被释放后，不久即参观了在皇家农业馆（Royal Agricultural Hall）举行的圣诞育肥家畜展览会。因此，该馆是笔者重点考察的地方之一。在1984年，笔者第一次亲往该馆旧址时，则与利物浦的前中央火车站旧址同样地被封闭了。其肮脏荒凉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1985年旧地重游，则已开始装修。1986年再去，则该建筑物已修复开放，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用途改为长期展出各种电脑的场地。原来笔者初时见到的，只是该馆的后门。开放后，笔者可以从后门走到正门，则别有洞天。正门可壮观！但可惜，笔者所看到的，正门外边泊的是小汽车而不是马车。里边挤得满满的是电脑而不是牛羊。更听不到公鸡啼母鸭叫。无论笔者怎么样努力地“神游冥想”，都无法重建当年情况。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让笔者找到19世纪末皇家农业馆展出鸡鸭牛羊的图片，虽然不是1896年12月8日孙中山亲眼见过的那批畜牲。

孙中山也参观过伦敦的水晶宫。该宫是为了1851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而在海德公园（Hyde Park）建造起来的。它也是大英帝国向全世界炫耀其工业革命辉煌成就的工具。所用的材料，全部是钢条和玻璃。故名水晶宫。博览会举行过后，全宫拆掉，建筑材料搬到郊区悉鼎纳姆（Sydenham）地区重建，并有所扩充，作为永久展览馆。新址连花园占地共200英亩，主堂1608英尺长，300到120英尺宽，175英尺高。从四方八面老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诚壮观哉！<sup>48</sup>可惜，时到今天，水晶宫早已被火神挟走，只留下青绿的一个大公园。很幸运，笔者又成功地找来当年水晶宫的照片。外形、内貌都有。

为了让读者对孙中山当时所处的实际情况也能得到比较准确的了解，笔者在翻译外名时，就以反映当时实际情况为准。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英国的建制很特别，不是从字面上可以准确地知道其意思。比方说，Inn这个名词，一般是小型旅舍的意思。因此，不明内里的人，很容易就把Gray's Inn这么一个专有名词，翻译成格雷旅舍。<sup>49</sup>其实，它是一所法学院，是英国专门教育和培训大律师（barrister）的学院之一。故笔

## 三 民主义伦敦探源

者就把它翻译为格雷法学院。

翻译地名时，也以反映实际情况为准。譬如，英语中的 Place，一般都翻译作广场。但经过笔者实地考察，如果发觉面积是小得可怜的话，则把它翻译成坊，更接近事实。Gray's Inn Place 就在此之列，故在本书里把它翻译成格雷法学院坊。<sup>50</sup>但如果发现，它其实是一条很直很宽的大街的话，就把它翻译作大街。Portland Place 就在此之列，故在本书里把它翻译成钵兰大街。又英语中的 Square，同样地一般都翻译作广场。大名鼎鼎的 Trafalgar Square，把它翻译作特拉法加广场，就名副其实。但是，格雷法学院里边也有一个 Square，名叫 South Square，就不能翻译成广场了。它只不过是该学院里两个院子当中的一个院子。所以，把它翻译南院，就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实际情况。至于上述的格雷法学院坊，经调查，只不过是位于该学院外围西边的一块小坊，与该学院毫无关系。只是由于该坊靠近该学院而以该学院命名而已。孙中山之住在该坊边上的一栋私人房子，与该学院没有任何正式关系。后来倒是方便了他频频前往探望住在该院宿舍里的一位学生，向他请教问题。

此外，伦敦街道的名称也有其非常特殊的地方。例如，circus 这个字，一般指马戏场。不明内里的人，看了侦探报告说、孙中山某天到了某某 circus，因而就说孙中山“偶去马戏场（Regent Circus）消遣”。<sup>51</sup>经考证，这个 Regent Circus 乃地名，是伦敦的摄政亲王街（Regent Street）与牛津街（Oxford Street）交界的十字路口，作圆形，故称 circus。<sup>52</sup>在 21 世纪的伦敦地图，再也找不到 Regent Circus 这个地名。因为，同一个地方，已被改名为 Oxford Circus。无他，19 世纪时，以该处交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界的两条街之中的摄政亲王街命名该 circus。这样做，是因为当时的确有一位摄政亲王（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存在。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就以摄政亲王街来命名该 circus。后来他去世了，当局就改用交界的两条街之中的另一条街，即以牛津街，来命名该 circus 而已。据笔者实地考察，离该 circus 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 Cambridge（剑桥）Circus；在首都怎么可以光有“剑桥 Circus”而没有“牛津 Circus”？因此改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英国治理时代的香港，把同样性质的十字路口，翻译成“回旋处”，取其交通在该处回旋的意思，<sup>53</sup>沿用至今。本书在翻译时，按实际情况而定。如果在某 circus 的交通，的确是回旋者，像在 Cambridge Circus 那样，就翻译作“剑桥回旋处”。否则就干脆直呼其为十字路口。参考孙中山访英时期的图片，则发觉在 Oxford Circus 的交通并不回旋，故笔者就把它翻译成为“牛津十字路口”。<sup>54</sup>

又例，如在伦敦市中心沿泰晤士河（River Thames）北岸的某一段河滨（strand），过去的市民干脆就为其起名叫 The Strand（河滨）。如果不是当地的居民，就无从知道它其实已变成一条路。为了清楚起见，笔者就用“河滨路”（即为它加了一个“路”字）的方式，来反映它的实际情况。同样地，Whitehall（白厅）是一条大街，以街旁一栋著名的白色建筑物（Whitehall）命名。故笔者就把它翻译成“白厅大街”（即为它加了“大街”两个字）的方式，来反映它的实际情况。至于该栋白色建筑物本身，其实是英国外交部办公的地方，故“白厅”又成了英国外交部的代名词。准此，当笔者在文中单单用上“白厅”这词汇时，意思就是指英国外交部，而不是指同名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的大街。

经过不断的反复考察，比较准确地了解了孙中山“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后，下一步就是通过“神游冥想”，去探索孙中山“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sup>55</sup>的缘由。

## 五 神游冥想

“神游冥想”，具体应该怎么办？在这方面，近代著名的新诗人、上古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就曾做过典范性的工作。对郭沫若先生的方法与成就，当今儒学大师余英时先生作过如下精辟的评价：“郭沫若以新诗人一变而为甲骨、金文的专家，大家都说他聪明绝顶。他的聪明自是不在话下。甲骨、金文在门外汉看来好像是一个一个字地辨认出来的，非日积月累不能为功。事实上治此学的人在具备了关于古史和古文字的基础知识之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的想像力，把初看毫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从而展示出全新的意义。”<sup>56</sup>

这段引文的最後两句，最具关键性。实践起来，笔者所凭的，倒不是郭沫若般的、诗人的想像。而是侦探般的联想与推断。同时，在主证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尽量找旁证，以便充实主证的内容。

就以 1896 年 10 月 4 日星期天为例吧。有关孙中山当天活动的主证，经过笔者 24 年不断地发掘，只获得下列两条。第一，康德黎夫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孙医生曾来访。”（原文 Dr Sun here）<sup>57</sup>第二，康德黎医生在一个月后作证时回忆说：“10 月 4 日，我们谈及公使馆……。”在这里，负责问话的财政部首席律师似乎打断了他的话，问他是否记忆清楚是 10 月 4 日。<sup>58</sup>所以康德黎说：“我相信是。”<sup>59</sup>单凭这么两条直接的原始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史料，怎么能跟三民主义连到一起？笔者征诸旁证，发觉康德黎医生的第三子倪理（Neil）与别人合作写的有关他父亲的《康德黎爵士》传里，有这么一句话：“某天中午进餐的时候，话题扯到公使馆。”<sup>60</sup>这似乎是家传口碑，从而可知当天孙中山不单造访过康家，而且曾留下来吃午餐。

孙中山应邀到康家吃午餐，是什么时候到达的？从这里起，笔者侦探式的“神游冥想”，就开始驰骋。根据笔者平常阅读所得到的知识、长时间在英国生活的经验、<sup>61</sup>平常与英国师友切磋所得，知道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基督徒在星期天如果不上教堂守礼拜的话，是不可思议的。康家大小都是基督徒，他们肯定会在星期天上教堂。孙中山也是基督徒，旅居伦敦靠近康家，他是会希望在星期天同样上教堂的，但人生路不熟（当天是孙中山到达英国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康德黎在邀请孙中山赴家筵的同时，会不会也很关照地邀请他一道上教堂？笔者相信是会的。而且，承香港大学建筑设计学系龙炳颐教授相告，尽管孙中山是在香港的公理堂（Congregational Church）受洗，但是自从进入香港的西医学院学习以后，却深受属于道济会（Presbyterian Church）<sup>62</sup>的何启、康德黎、孟生等恩师的影响，因而改为在道济会堂守礼拜。<sup>63</sup>康德黎回到英国后，在伦敦肄业，又改在英国国教——圣公会（Anglican Church）——的教堂守礼拜。承恩师盛情邀请，相信孙中山也乐得顺水推舟。

什么时候上教堂？按照当时英国社会的状况，有钱人家，中午以前上教堂，仆人在家里准备午餐。仆人在服侍过主人进午餐、再打扫干净之后，于黄昏时分上教堂。笔者有幸看过康德黎夫人日记，知道康家是有仆人的。所以，康家是会在上午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之前上教堂的，因而孙中山在10月4日当天，会提前到达康家，以便一道上教堂。

康家所上的教堂是那一座？在什么地方？笔者把康德黎夫人的日记，从头到尾地反复看，发觉其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她说他们一家在圣马丁教堂 taken sittings。<sup>64</sup>如果用现代英语来理解这个词汇，肯定摸不着头脑。但是，如果用19世纪英国中产社会的英语，这个词汇就好解释。原来当时英国圣公会的教堂，在堂内某区的好几排木头长椅座位，靠背的木板都特别高，以至看不到前后的人。进入长椅的地方有一道门，闲人免进。四周围了“木板墙”，可谓“自成一厢”。高贵人家，会长期在特定的时间、租用固定的“一厢”（英语叫 family pew）。别的人不能在这特定的时间进入这“厢”，或坐在这固定的一张长椅。所以 taken sittings 这个词汇，可以勉强翻译为“在教堂里长期包厢”。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孙中山当时所遇到的英国社会，阶级界限是非常森严。而他通过康德黎医生所活动的圈子，都是伦敦的中产社会。当英国社会越来越走向自由平等的时候，在圣马丁教堂“长期租了固定座位”这个制度，终于在1914年被取消。<sup>65</sup>

康家既然在圣马丁教堂长期租了固定座位，当然在星期天从伦敦家里上教堂时，都会上该教堂。1896年10月4日的星期天，自然也不会例外。而按照1896年那个时代的规矩，英国圣公会辖下的教堂之如圣马丁教堂，星期天上午的礼拜，会在早上11:00时开始，12:30左右结束。<sup>66</sup>

该教堂位置在什么地方？经考证，它位于著名的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的东北角。该广场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英国的很多公开活动都在这儿举行，包括大型的示威行动。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在1896年10月4日当天中午时分，该广场有什么活动？

翻阅伦敦的《泰晤士报》，发现当天中午在该广场，果然有大型的示威游行聚会。超过五千名伦敦市区出租马车的马夫，在出租车工会的号召下，在当天罢工，游行到特拉法加广场，然后在该广场聚会。工会的领袖在聚会上发表演说。当孙中山与康氏一家，从圣马丁教堂守礼拜完毕，步出教堂时，由于教堂的正门面向广场，而且正门的平台高过广场，马上可以看到广场上人山人海。同时，还有不少罢工的车夫，在各种夺目的旗帜与铜管乐团的带领下，从四面八方向广场进军。<sup>67</sup>

孙中山看了这种情景，一定会吓了一跳。在满清统治下的中国，这么多人聚会，不是造反了！从孙中山在1897年发表的文章《中国之现状与未来——改革党吁请英国善持中立》<sup>68</sup>和《中国之法制改革》<sup>69</sup>，孙中山对于满清政府的专制腐败，是有深切了解并有亲身经验的。

孙中山看到这么多的马车夫聚集而感到惊讶，并向恩师康德黎请教原委，是必然的。这样，康师会告诉他，在英国，民权已相当发达。群众有结社的自由，所以出租车夫可以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工会。并为工会向政府登记注册，成为合法的群众团体。如果某合法的群众团体需要通过示威，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不满情绪，可以向维持治安的警察总监申请，以便上街游行示威。申请时，要说明游行的人数大约多少，游行的路线是什么。警察当局经过研究而批准后，还会派出警察陪同示威者游行，以便维持秩序。警察在沿途也会采取一些应变措施，既方便游行顺利地示威，又可以在游行遇到困难时（如因劳晕倒等）给予帮助。

康师的解说，对孙中山来说，肯定引起极大的震荡，让他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对民权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亲眼目睹，与他过去在香港阅读有关遥远的西方民权主义的书籍，到底是不一样。

接着，孙中山肯定会追问，出租马车夫为何示威？综观康德黎的一生，热心服务社会，他后来被册封为爵士，正是由于他对社会的贡献。他也是有文化的人，相信他每天都会看报纸。而看的，很可能是当时最著名、最权威的《泰晤士报》。据该报报导，马车夫的罢工，早在13天以前（即1896年9月22日）就开始。导火线是伦敦各大火车公司，高价卖出执照，让持照的马车夫到火车站接客。没有执照的马车夫，则只许把他们从外边接到的客人送到火车站，而不许从火车站接客。售卖这种执照，让各火车公司发大财，却增加了马车夫谋生的困难。<sup>70</sup>罢工以来，双方冲突与日俱增。报纸天天都有报导。康德黎医生除了口头向孙中山介绍过罢工的前因与过程以后，相信会把过去13天的旧报纸给他看。并与他讨论阅报所得暨英国各方面的国计民生。民生：这不正是民生问题吗？民生主义的种籽就从这里破土而出。

关于出租马车夫罢工的事情，本书第五章会有进一步的描述与分析。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情，主要目的是印证本章开宗明义地引述过的孙中山所说的话“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乃采取民生主义。”<sup>71</sup>并以此作为一个例子，说明笔者探索三民主义渊源的办法。

本章的这一节证明，尽管长期搜集，也只能获得“残余断片”。但如果能够耐心地广集佐证，细心地反复考证，再通“神游冥想”，虽不敢说“窥测其全部结构”，<sup>72</sup>但最低限度能得“出全新的意义”。<sup>73</sup>当然，这种做法，牵涉到某种程度上的主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观判断。这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事情。

正因为笔者这种做法，牵涉到某种程度上的主观判断，所以自从1979年开始研究《三民主义思想探源》这个课题以来，一直放心不下，怕自己武断、不够客观。而且，尽管找出了孙中山的所见所闻，也无从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但别无他法之余，笔者只好坚持默默地采取这种方法；同时不断地告诫自己，不要武断和过分主观。待有缘读到陈寅恪先生的遗作，心头的压力稍为减轻，但已经是1999年11月的事情。当时笔者为了应邀参加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承该会召集人、广州市中山大学胡守为教授的帮助，才有缘拜读了陈寅恪先生的宏论，增加了写作的一点信心。

回想1992年10月，笔者已拜读了余英时先生的鸿文，并通过该文介绍，而追阅了特瓦若柏教授（Hugh Trevor-Roper）的演讲词。但是窃以为他们两位先生所说的，都是历史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想像力和联想力。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神游冥想”走得远。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句话，是在他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的。笔者有先例可援，又增加了一点信心。

凭这点滴信心，还是没法让笔者安枕。后来拜读了罗久蓉博士的书评，<sup>74</sup>深受启发。于是修书讨教。承罗博士不弃，建议笔者在把搜集到与联想到的史料有系统地摆出来以后，自己就飘然度外，让读者们个别地更进一步地去“神游冥想”该史料与三民主义的渊源。<sup>75</sup>笔者觉得这是非常高明的主意。所以笔者决定，采纳罗博士的建议，点到即止：就以本节的史事为例吧，在重建了1896年10月4日孙中山的活动情节（其中的高潮是他亲身体会数千马车夫示威游行）以后，就不多说了，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让读者们自己去进一步“神游冥想”该等情节与“民生主义”的渊源。尽管在本书第二部分“分析历史”中，标明第五章的题目是“民生思想探源”，这个探源的方式，只限于把第一部分中重建起来的历史、其中有关民生的事例集中起来，像积木一样，砌成一幅比较合理的图案后，再用民生主义产生在西方历史的背景加以说明，并结合当代学者在英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里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加以评论。接下来的，就让读者诸君自己驰骋丰富的想像力去“探源”了。处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方法相同。

## 六 时空范围

孙中山说他在伦敦脱险后，是暂留欧洲两年之中的所见所闻让他完成了三民主义之主张。<sup>76</sup>笔者要探索他思想的渊源，就必须考证所牵涉到的时间和空间。孙中山“留欧”的时间长了，体会就深。走的地方多了，见闻就广。其理至明。

孙中山那句话的用词，似乎别具匠心。他用“伦敦”来衬托“欧洲”，给人的印象是，他从伦敦脱险后，就跑到欧洲去见闻见闻。同时，他笼统地说“两年”，具体时间究竟有多少？准此，笔者就在这一节，考证他“留欧”的时间和空间。

从时间上说，《伦敦蒙难记》讲孙中山是1896年10月1日抵达伦敦的。<sup>77</sup>因而中文著作多沿其说。该书原著是英文，1897年在英国出版。因而英语著作，如史扶林教授在1968年出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英文版）时，亦按此日期。<sup>78</sup>但是，正如上面引述过的，侦探报告说孙中山在1896年9月30日乘“雄伟”号到达利物浦，同日坐火车于晚上到达伦敦。<sup>79</sup>这条史料，笔者找到两条佐证。第一，清朝驻华盛顿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公使杨儒在致驻英公使龚照瑗的密电中，就指明孙中山所乘的轮船，名字就叫“雄伟”号，是从纽约开往利物浦的。<sup>80</sup>因此驻英公使才差人雇请私家侦探，前往利物浦监视。<sup>81</sup>第二，利物浦的一家报纸刊登了“雄伟”号在1896年9月30日抵达利物浦的消息。<sup>82</sup>

至于《伦敦蒙难记》为何弄错日期（虽只差一日），则窃以为与该书的真正作者有关。经笔者考证，该书的真正作者并非孙中山，而是其恩师、救命恩人康德黎医生。<sup>83</sup>康德黎医生之所以弄错日期，是可以解释的。孙中山在到达伦敦的第二天，即10月1日，就马上前往拜访恩师。<sup>84</sup>所以，在康德黎的印象中，错记孙中山是10月1日到达伦敦的，也不足为奇。

准此，我们可以肯定孙中山是1896年9月30日到达英国暨伦敦的。

至于孙中山是何时离开“欧洲”的问题，则侦探报告没有说明具体日期。<sup>85</sup>根据侦探1897年7月11日到24日的报告，史扶邻教授笼统地说，孙中山是1897年7月离开英国的。<sup>86</sup>其实，该侦探报告中有一条很可贵的线索，即孙中山所乘的轮船之名字叫“纽米地安”号（S. S. *Numidian*）。<sup>87</sup>另一条线索是康德黎的一位孙女所写的一本书。该书说，康德黎夫人在伦敦码头送别孙中山，但该书没有标明日期。<sup>88</sup>据此，笔者遍查伦敦各大报章，在1897年6、7、8月，所载轮船启碇的日期，奈何均属徒劳。后来改变办法，终于查出该船所属公司的名称，接着追查，方知该船是从利物浦启航者。于是改为普查利物浦的报章。终与找到《利物浦信使报》中的一则珍贵新闻。该报在1897年7月1日宣布，“纽米地安”号（S. S. *Numidian*），将于当天开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Montreal）。<sup>89</sup>所载目的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地，与侦探的报告吻合。<sup>90</sup>翌日，该报又宣布该船已于昨天开航。<sup>91</sup>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孙中山是在1897年7月1日离开英国前往加拿大的。但是，上述史料均属间接。这个假设不能令人放心。

后来笔者有幸得阅康德黎夫人日记。她在1897年6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送别孙中山，他将暂往日本寄居。”<sup>92</sup>征诸南方熊楠日记，则说得更具体。南方熊楠在1897年6月30日的日记中说，他清早往孙中山寓所，然后陪他往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总站（St Pancras Station），在那里惜别。<sup>93</sup>当时驶往利物浦的火车，均从该站起行。九个月以前的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从利物浦乘火车到伦敦，也是在该总站下车。<sup>94</sup>后来，笔者更在伦敦的《地球报》中，找到孙中山签署的《告别英伦书》，该信的日期是1897年6月29日。<sup>95</sup>看来该船是早上启碇。如果孙中山在启碇当天，才从伦敦坐火车前往利物浦，就来不及了。所以提前一天到利物浦过夜，翌晨上船。

根据上述各种史料，互相参照，我们可以肯定，孙中山是1896年9月30日到达英国，从利物浦入境。1897年7月1日离开英国，从利物浦出境。留英时间，是整整的九个月，首尾两个年头。

从空间上说，孙中山所说的“留欧”，有没有包括英国以外的其他欧洲国家？史扶邻教授认为没有。所据乃史雷特私家侦探的报告。因为，该等报告没有提及孙中山曾经到过欧洲大陆的国家。笔者将该批报告逐字逐句地细读。可知其中共缺48天的报告，即1897年4月23日到同年6月10日的报告。孙中山会不会在这段时间去过欧洲其他国家？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征诸南方熊楠日记，则南方熊楠提到过，在5月8、24日和26日等日子，都见过孙中山。<sup>96</sup>这样就把私家侦探报告中空白出来的48天，分割成几个小段。即使孙中山真的到过欧洲大陆一游，也只能是非常短暂的。

相反地，南方熊楠和康德黎夫人的日记，都只字没有提到孙中山曾去过欧洲大陆。孙中山经常与他们见面，如果他要到欧洲大陆去，相信他是会跟他们说的。尤其是康德黎伉俪，曾是孙中山的救命恩人。如果孙中山不吭一声，就离开伦敦跑往欧洲大陆，于情不合，与理相悖。不要说跑往遥远的欧洲大陆，就连孙中山跑往伦敦东区，康德黎医生也表示不放心。因为，该区多码头，有不少华人水手寄居在那儿。康德黎怕清使馆故伎重施，派人混杂在水手群中，把孙中山再度绑架，就地上船回国正法。因此，如果孙中山真的要前往欧洲大陆一游，肯定会向康氏夫妇打个招呼。而按康德黎夫人日记的内容来判断，她也会把这类事情写进她的日记的。笔者把她的日记反反复复地看了几十遍，都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所以笔者推断，孙中山并没有到过欧洲大陆。<sup>97</sup>

把跨越两个年度、而实际只得九个月的时间，含糊地说成是两年，虽然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是允许的。但是，饱受现代英式教育的孙中山，也感到有必要求助于这种保守的中国传统习惯。我们对于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孙中山有意夸大他在西方土地上学习的时间，目的是突出他三民主义的分量。同样地，虽然按照一般习惯，一个人即使只到过英国，但却说成是到过欧洲，也勉强可以接受。因为英国本来就是欧洲的一部分，就像外国人到过广州也可以说成是到过中国。但孙中山的做法，又一次可以被解释成为，他希望他的同胞认为他的学习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经验并不局限于英国，因而进一步突出他三民主义的分量。由于孙中山有这种夸大的倾向，让笔者加倍注意衡量、考证和核对他所说的每一句有关语言。

总的来说，孙中山九个月的活动都集中在伦敦。偶尔他也走到伦敦以外不远（可以当天来回）的地方如温沙堡（1896年11月1日）、牛津大学（1897年1月底）、朴次茅斯市附近的斯皮特黑德（1897年6月26日）等。<sup>98</sup>伦敦是当时全世界最大、最重要、最多姿多彩的超级大都会，是全球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孙中山那世代而能够在那儿自由自在地学习，已是极端难能可贵的机会。同时通过康德黎医生的关系与康德黎的圈子，加上伦敦蒙难的名气，孙中山会比一般人要学习得更顺利。

## 七 本书脉络

本文作为本书的第一章，重要任务之一是阐明本书的研究方法。但愿这个任务，在本章的第一到六节，已勉强完成。目前这第七节，希望介绍整本书的脉络。

第二章，把孙中山留英九个月当中，每一天的“所见所闻”，都试图作个日志。办法就如第五节中介绍过的重建1896年10月4日星期天孙中山的活动与思考过程那样：首先收集有关当天的“残余断片”，再通“神游冥想”，把表面上似乎毫无关连的史料联想起来，砌成一幅图案，结合英国的时代背景和当代研究成果，加以说明，以便读者用自己的想像力进一步“驰骋”。

用以编写日志的史料，主要有五种。

第一，当然首推史雷特私家侦探社（Slater's Detective As-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sociation) 所写的报告。该社受雇于清驻伦敦公使馆，从孙中山抵达利物浦那天开始就盯上他。罗家伦先生曾将这批报告附录于其名著《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南京：京华印书馆，1935)，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功德无量。

这种千载难逢的第一手资料，对于为孙中山编一个旅英日志，是极为珍贵的史料。但必须指出，这批报告有几个致命的弱点。第一，该社的侦探似乎不是24小时监视孙中山的。报告不断出现一个关键词，就是“恢复监视”。其中有两篇报告甚至写明当天九时、恢复监察。<sup>99</sup>如果某天，该侦探在孙中山出门以后，才到达孙中山寓所附近恢复监察的话，当天就要交白卷。结果，在孙中山被绑架前的最具关键性的几天，侦探都没法具体地说出孙中山每天做过什么。而是非常笼统地说：“每天都恢复侦察，惜无要闻。目标天天逛大街，不在寓所进膳而在咖啡店吃餐。”<sup>100</sup>相反地，在其他日子，如侦探真正盯上孙中山，其报告就属可靠，而为探索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来源，提供了很丰富的材料：孙中山多次探访其恩师康德黎医生，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阿拔工艺馆、动物公园、农业展览，甚至跑到老远的水晶宫看全国自行车展览。<sup>101</sup>

侦探报告的第二个弱点，则凡是星期天，侦探都偷懒去了。笔者曾经把全部侦探报告逐一研究过，发觉凡是星期天的报告均属含糊其词，或是无可奉告。<sup>102</sup>其中最可恶的一个星期天的报告，当然是孙中山被绑架的1896年10月11日。当天的侦探报告，信誓旦旦地说目标“没有离开过寓所，无疑是由于天气恶劣的缘故。”<sup>103</sup>笔者查过当天的天气报告，侦探怎能“曾下过丝微细雨”<sup>104</sup>说成是“天气恶劣”？难怪公使馆的英文参赞马格里爵士(Sir Halliday Macartney)，于孙中山被幽禁在

## 三 民主义伦敦探源

公使馆后的翌日（1896年10月12日星期一）即亲身跑到该侦探社的办公室，严厉要求该社的负责人交代孙中山的行踪！<sup>105</sup>

侦探的报告第三个弱点，是用了不少别名土话，让现代人摸不着头脑。例如，侦探说某天孙中山跑到 Stone Buildings（石楼）中的饭堂和图书馆参观，<sup>106</sup>害得一位学者误会，以为孙中山到了一个名字古怪的石室图书馆读书。<sup>107</sup>经笔者亲到该地采访，发现石楼是当时林肯法学院的别名。以该学院其中最著名的一座建筑物的名字——Stone Buildings（石楼），以一盖全而得此别名。<sup>108</sup>

第二章当中、第二种用来编写日志的主要材料，是康德黎夫人的日记。康德黎夫人不是政治家。政治家写日记，有时候怀着政治目标，甚至准备日后出版，借此标榜自己，或者为自己辩护，故其准确性要打折扣。康德黎夫人写日记，目标主要是自娱。没有夸张或隐瞒的必要，因而可靠性很高。但是，私人的日记，本来就是不公开的。女性的日记，更是如此。笔者承英国剑桥大学挚友米高·劳尔博士（Dr Michael Lowe）介绍，得以拜会康德黎医生的第四子肯讷夫·康德黎上校暨二媳妇，至以为幸。但当笔者提出阅读该日记的要求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日记属私隐，不能给外人看。后来大家相处的时间长了，康家后人认为可以信赖笔者，才由康德黎医生的嫡孙出面，邀请笔者到他家里小住，以便在他家里阅读。后来更借打字机予笔者，以便加快抄写的速度。这是让笔者非常感激的。

康德黎夫人所用的是现成日记簿。每天能用以填写的空位不多，所以每句话都非常简短。但这些简短的文字，有时可以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价值连城，足以推翻铁案。例如，著名的《伦敦蒙难记》，大家都认为是孙中山所写的。该书原著是英文，文笔流畅，充满英国绅士式的幽默。如果是孙中山所写的，那么凭这样流利的英语，他对“所见所闻”，当然就理解得既容易又深刻。不然的话，就比较难于测量其深刻的程度。因此，从探索三民主义思想来源这个角度来说，搞清楚该书英文原著的作者是否孙中山，就显得特别重要。康德黎夫人的日记，很清楚地显示，该书是康德黎医生代笔的。笔者通过一番考证，更无怀疑的余地。<sup>109</sup>如果该书的英语水平不能作为测量孙中山了解留英时期所见所闻的标准，那么，标准往哪儿找？笔者认为，孙中山的英语手稿，是个非常可靠的标准。笔者在美国的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sup>110</sup>和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里，<sup>111</sup>都看过大量孙中山的手稿。窃以为按照手稿所显示的英语标准，孙中山要了解其所见所闻，是不成问题的。

第二章当中第三种用来编写日志的主要材料，是日本植物学家、南方熊南先生的日记。1983年初，笔者在牛津大学的一个学术讲座上，承剑桥大学的好友日本学专家卡门·比力加博士（Dr Carmen Blacker）相告，南方熊南的日记经常提到孙中山。同年8月，笔者马上到日本去。承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阪野润治教授帮忙，寻得该日记，填补了侦探报告和康德黎夫人日记中的一些空白。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空白是1897年6月26日孙中山的活动。南方熊楠在翌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孙中山与田岛去看海军检阅”。<sup>112</sup>这条资料说明，孙中山去过当天在英国皇家海军总部朴次茅斯市（Portsmouth）附近的斯皮特黑德（Spithead）观看海军检阅。这个检阅是为了庆祝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而举行的盛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大庆祝活动。

英国以海军立国。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是以强大的海军建立起来，又赖该庞大的海军维持的。英国著名的炮舰外交，就曾经让中国吃尽苦头。<sup>113</sup>而1897年的英国海军，正是处于鼎盛时期。1897年的大英帝国也正是该帝国的颠峰。它征服了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占据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哪里有阳光，哪里就有米字旗在飘扬。<sup>114</sup>孙中山所看到的海军检阅，正是这颠峰帝国的缩影。“没有必要强调这个举世无双的场面，会在观众的心目中产生怎么样的印象……海上的绝对优势属于大英帝国，而她也绝对不会放弃这个优越地位。这一伟大事实，是任何睁开眼睛的人，不管是不是英国人，都不敢争辩的。”<sup>115</sup>孙中山目睹军容，心里起过震荡吗？赶上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而阅兵，让早已沸腾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情绪乘机当场爆炸。<sup>116</sup>熊熊烈火，孙中山可曾被灼着？这种爆炸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着一波又一波历史的发展……所谓“新帝国主义”从此开始了。这种“新帝国主义”比过去任何时期的帝国主义更霸道。<sup>117</sup>身处汹涌波涛的孙中山感受又如何？

从孙中山日后的行动和著作中，可以看出该震荡是不小的。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Colorado）的丹佛市（Denver）。他当然希望尽快回国，而最快捷、最方便的路线，应当是横渡太平洋。但是，他却舍近就远而取道伦敦。<sup>118</sup>为什么？他认为幼嫩的革命政权的生死存亡，决定于英国政府的动向。他必须取道伦敦，争取英国政府的支持，革命政权才有一线生机。他写道：“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予于是乃起程赴纽约，觅船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渡英。”<sup>119</sup>孙中山当时看到的不单是英国海军慑人的军威，还有那人山人海的英国观众那种如痴如狂的民族主义情绪，<sup>120</sup>对他自己正在构思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形成，有莫大的推动作用。

这震荡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历久不衰。孙中山逝世前五月（1924年8月底），广州商团罢市；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宣布要用武力镇压。英国驻穗署理总领事警告孙中山说，如果孙动武，英国皇家海军驻远东舰队将全力对付他。孙中山虽然口头谴责英帝国主义，但实际行动却是以北伐为名带了部属离开广州，暂驻韶关。并多次电命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带领该校师生到韶。<sup>121</sup>其动机很明显，不打商团会失信而丢脸。打吧，又真的害怕英国武装干预。遂借故北上以避其锋芒。但考虑到蒋中正暨师生留在黄埔，则万一英国海军与商团联手进攻黄埔军校，当无幸免。故屡次电催。蒋中正没受过像孙中山1897年6月26日的震荡，所以不像孙中山那么担忧，因而抗命不从。其实，孙中山早就嫌广州毗邻香港，在英国皇家海军的阴影下活动，太不保险。故多年以来，一直希望转移到中国的西北，以便依重苏联，先图北京，再求统一全国。可惜，苏联为了自身利益，没有同意。<sup>122</sup>孙中山越是感到自己力量的薄弱，越是羡慕英国强烈的民族意识，越是不断丰富和推广自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他的三民主义就是在他主持广州军政府时期，于1924年1月起，带着病躯，奋力以演讲形式完成的。他的第一讲，就是民族主义。<sup>123</sup>至于商团事件，据笔者分析，孙中山最后发觉英国海军迟迟没有行动；这与1923年12月、列强军舰云集白鹅潭的景象，大相径庭。他虽不知英署总领事先时是越权发出警告，而已遭伦敦谴责，但肯定怀疑其中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必有蹊跷。更逢苏联的军械又在这个时候运到，英方同样没有表示。于是当机立断，秘密返穗，并立即下令镇压商团。不过此乃后话。<sup>124</sup>

第二章当中第四种用来编日志的主要材料，是英国的报纸，尤其是权威的《泰晤士报》。报纸当然不会报导孙中山个人的每天活动（除了他被绑架的消息传出后轰动了全球的那几天）。但是，结合文献、联想与钻研，可以开辟新天地。譬如，侦探报告说，1897年1月13日，孙中山跑到伦敦蜡像院（Madame Tussaud's Waxworks Exhibition），参观展览去了。<sup>125</sup>该院当天展出甚么？侦探没说。征诸《泰晤士报》，可知是展出约翰王（King John）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sup>126</sup>这段历史，发生在1215年，对英国日后的发展、尤其是民权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现在该院决定用蜡像的形式，让历史重现，具广大的教育意义。孙中山前往参观，正符合他自言“暂留欧洲”的目标。他看过这栩栩如生的蜡像展览、阅读了展览说明后，肯定会在大英博物馆追阅有关典籍。于是，笔者又找来类似的刊物进行钻研，以便重建当时孙中山的心情与知识状态。同时，把《大宪章》握要地节译出来，方便读者“神游冥想”。总之，如果没有《泰晤士报》提供的讯息，这一切就无从着手。

报纸甚至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孙中山到底在哪一天进行了哪一些活动。以及提供活动的内容。譬如，1896年10月3日星期六，孙中山干了些什么？侦探报告没有提供具体的内容。只是在三天以后（1896年10月6日）的报告中，泛称目标连日来，只顾天天逛大街。又说他从来不在寓所进膳，只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的小吃店用餐。<sup>127</sup>康德黎夫人的日记，也没有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提供任何线索。至于南方熊楠日记，则当时南方熊楠还未认识孙中山，当然也不会提到他。

征诸其他原始史料，则发觉一个月后，孙中山在财政部首席律师（Treasury Solicitor）面前所作的证词中，有非常有趣的信息。孙中山说，从10月1日首天在伦敦观光起，到11日早上被公使馆绑架之时止，这10天当中，“某天去了水晶宫（one day I went to the Crystal Palace）”。<sup>128</sup>在这10天当中，头两天和第四、第十天的活动，已经查清楚了。<sup>129</sup>余下的6天当中，孙中山是哪一天去了水晶宫？侦探报告和康得黎夫人日记，都绝对没提孙中山在这段时间去过水晶宫。

笔者把这6天的《太晤士报》其中有关水晶宫内各种活动的广告都查遍。窃以为1896年10月3日星期六这一天，在水晶宫由英国皇家园艺协学会（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所举办的英国水果展览（Show of British Grown Fruit），应该是最能吸引他的。为什么？众所周知，孙中山对农业的兴趣是非常浓厚的。他的首篇论文《农功》（写于1891年前后），就是关于如何让中国农业现代化。<sup>130</sup>现存的他的最早的三封书信：1890年的《致郑藻如陈富强之策书》；<sup>131</sup>1894年的《上李鸿章陈救国大计书》；<sup>132</sup>和1895年的《成立农学会征求同志书》；<sup>133</sup>也是着重谈这个问题。所以，去参观水果展览，与孙中山一直以来关心民生思想是一致的。后来在1896年12月8日，他参观了每年一度的英国最大规模的圣诞育肥家畜展览；12月11日，他再度到了水晶宫，参观每年一度的全英国自行车展览等等，<sup>134</sup>同样与孙中山关心民生的思想是一致。他前后一致的行动，让笔者作出判断：他很可能在1896年10月3日星期六这一天，去了水晶宫参观全英水果展览。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水晶宫其他日子的活动，有没有比这个水果展览更能吸引他的呢？其他日子的活动，绝大部分是音乐会，他不必跑那么老远<sup>135</sup>地去听音乐。<sup>136</sup>而且，这个水果展览，只举行两天。即10月3日这一天和前一天。有关广告，前一天在《泰晤士报》头版刊登。<sup>137</sup>前一天中午，孙中山跑进文具店时，买了报纸阅读，<sup>138</sup>从而注意到这头版新闻。后来边吃午餐边看报。吃过午餐后，已是下午13:45。<sup>139</sup>去遥远的水晶宫是来不及了。只好等到第二天，去逛一整天。这样反复推敲，广为引征，让笔者作出最后判断：孙中山在1896年10月3日星期六这一天，去了水晶宫参观全英水果展览。

第二章当中第五种用来编日志的主要材料，是英国外交部的档案。在孙中山旅英9个月期间，英国外交部有关他的档案，最丰富的当然是该部把他从清朝驻英公使馆拯救出来前后那几天。之后，就消声匿迹了。笔者曾经把该部9个月当中每一天的档案都从头到尾，又从尾到头地反复看了多遍，尽量搜索有关孙中山的蛛丝马迹。但是，除了关乎绑架案的材料以外，斩获甚微。这也难怪，当时的孙中山，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流亡者。高高在上的英王陛下政府，出于人道与碍于面子，才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他拯救脱险。事完以后，哪里还有空再管他？大英帝国的事务多着呢！

但是，孙中山说过的一句话启发了笔者。他说他在伦敦脱险后，暂留欧洲，除了考察政治风俗以外，还“交结其朝野贤豪”。<sup>140</sup>如果是英国的朝野贤豪，那么英国政府的档案里肯定有朝野贤豪的蛛丝马迹可寻。尽管孙中山1896—1897年间旅英那9个月时间的政府档案没有该等线索，日后总会出现的。问题是，英国政府的档案可以说是浩瀚如海。要找日后有关孙中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山暨其英国朋友的史料，有如大海捞针。但是，有一点给了笔者信心：一般的大海捞针，不一定能捞到针；可是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捞有关孙中山的针，则迟早会捞到。因为，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上，到底不是等闲人物；其一举一动，都足以影响英国在华的广大利益，因而深受英国当局关注。孙中山如果真的结交了英国的朝野贤豪，则该等贤豪尽管平常不吭一声，但于英国在华利益受到影响时，肯定会有所表示。若笔者能把英国外交部有关中国的档案，一天继一天地把文件一份接一份般看下去，直到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为止，肯定有所收获。果然，当笔者看到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三天的档案，就发现有一位巴卡（J. Ellis Barker）先生，从伦敦的宪法俱乐部（Constitutional Club）写了一封信给英国总理阿斯区夫（Henry Herbert Asquith），自称几个月前才与孙中山及其同僚多次面谈过。孙中山对自己的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并殷切期待西方列强高抬贵手，不要干预中国革命。巴卡先生接着说，现在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了，他衷心希望英国驻华部队的司令，千万不要对起义军采取任何军事行动。<sup>141</sup>

回顾1897年1月18日的私家侦探报告，内容说孙中山在当天上午11时30分，即从康德黎医生家里出来，雇了一部马车，直趋宪法俱乐部，在那里停留到黄昏5时30分才离开。孙中山在宪法俱乐部里见了什么人？干了些什么事？侦探就无可奉告了。当笔者在24年前，第一次阅读了这份侦探报告时，就心痒难搔。因为第一，在伦敦，像宪法俱乐部这样的组织，正是朝野贤豪聚集的地方。当时英国的政要，如果家住在伦敦市区以外的，都参加这样的俱乐部，以便国家议院开会时，有暂时寄居的地方。笔者也实地考察过这个宪法俱乐部，其建筑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之高，规模之大，是笔者访问过的所有俱乐部当中的表表者。<sup>142</sup>第二，宪法俱乐部就在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的东南角附近，从康家走路去，完全没问题。孙中山却决定破费坐出租马车前往，可能是要让该俱乐部的门卫知道，他不是等闲之辈，让门卫不要当拦路虎。第三，孙中山是在午餐前到达，下午茶（英国上流社会有著名的、喝下午茶 afternoon tea 的习惯）以后好一阵子才离开，招呼他午餐及下午茶的主人，肯定是该俱乐部的会员。他是谁？现在看来，很可能就是这位巴卡（J. Ellis Barker）先生。

至于这位巴卡（J. Ellis Barker）先生到底是何方神圣？征诸文献，<sup>143</sup>则似乎是<sup>144</sup>巴卡爵士（1840—1914）。他白手兴家，创立了巴卡公司。富而从政，在1906—1910年间曾当选为下议院议员，1908年被册封为从男爵（Baronet）。可见是一位有分量的人物。<sup>145</sup>

第三章“图篆”，是在第二章“日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即按照日志所提供的有关孙中山当天活动的消息，找来有关图片，以便丰富日志的内容，重建当时孙中山活动的环境和气氛。让笔者和读者在某个程度上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sup>146</sup>

总的来说，笔者尽量发掘孙中山那个时代的照片或图画。不得已，则退而求其次，找接近那个时代的照片或图画。实在没办法，才采用笔者自己拍的当代照片。采用当代照片时，有一个标准，就是建筑物必须依旧，尽管交通工具和其他细节改变了。有时候笔者较爱采用孙中山那个时代的人所绘的图画，活灵活现的，比照片更能突出那个时代的精神。

笔者在选用旧图片和拍摄当代照片时，均以最能代表孙中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山当时直线往前看所见到的景象为标准。这样，当本书读者看到该等图片时，就与孙中山当时看到的景象，差不多一样。这更有利于读者诸君自己去“神游冥想”。但是，有两三张图片，为了服务于某一个特定目标，而采了别的角度。遇到这种个别情况，笔者会在图片上加上标签，说明孙中山所在的位置，以及在对该图片做解说时，作适当的声明。还有两三张图片所代表的景象，是孙中山肯定没有见过的。但是，为了服务于某一个特殊目标，笔者又收进本书。遇到这种情况，笔者也会对图片加以说明。

最后，连图片也表达不了的，像公使馆与康德黎住宅之间的距离与方位，和公使馆与马格里爵士住宅之间的距离与方位等，就用地图来表达。用当代的街道图不行，像上述的税氏酒肆，其所处的街道已改了名字。而马格里爵士的住宅，更早已被拆掉；连街道也从当代地图中消失了，因为在原来的短街上已建起了高楼大厦。经过一番努力，找到了19世纪英国陆军部为了防卫伦敦而绘的军用地图，非常详细和准确，才解决了本书一个极头疼的问题。

另一个非常要紧，但同样棘手的问题，是要找出一些具关键性的建筑物，如公使馆的内部是如何结构的。就以公使馆为例吧，孙中山被绑架进入该建筑物后，往内多走一步，就是与外界多隔绝了一层，生机又少了一线，由此而造成心中的恐惧，又多了一分，对他的人生观甚至其学说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搞清楚公使馆内部的布局，孙中山进入了大门口以后，如何弯弯曲曲地被带到幽禁的房间，其重要性自不待言。笔者有幸，在1969年9月底该建筑物还存在时，即应邀参加当时的代办处举行的庆祝国庆招待会，在可能范围内，上上下下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下、里里外外地，参观过一遍。后来笔者全力研究孙中山，又趁上大使馆准备把该建筑物改建，而依法聘请了英国建筑师为该建筑物一层一层地绘了详细的平面蓝图；并应笔者要求，复制了一整套蓝图免费送给笔者。笔者如获至宝，请摄影师拍成照片。现把有关部分收进书里，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迟到今天才开始动手研究这个课题，则原公使馆已被全部推倒重建，外貌依旧而内容全非。蓝图也因为“重建”代替了“改建”而作废，可能早已失存。同样地，以21世纪今天的一切讲经济效益的社会风气下，笔者也绝对没有能像过去那样，购买笔者所发掘到的现在收入本书的珍贵旧图片。

在整理图片准备出版时，由于图片的数目太多和复杂，笔者必须自己动手用电脑素描。有时候为了对某一张图片加工，而化上好几个小时，也在所不惜。有必要时，笔者为一些地图、蓝图、甚至一两张特殊照片，加上一两道汉语标签，以方便读者。

整理图片完毕后，发觉1897年5月整个月、都没有一幅图片。主要原因，是因为侦探报告整月全缺，可能早已失存了。康德黎夫人的日记，对孙中山也只字没提。只有南方熊楠的日记说，曾在8、24、26日见过他。鉴于孙中山曾说过，他的所见所闻，让他注意到民生问题。所以笔者决定搜集当时有关民生的图片，一天一幅地，31日共收入31幅图片于本书第三章的5月部分。其中有照片、写实、速写等。笔者考虑到，尽管孙中山在街上见到乞丐，侦探也不会报导。所以，并不由于侦探没有报导，就认为孙中山没遇到过乞丐。而且，孙中山旅居的霍尔本区（Holborn），正是19世纪英国大名鼎鼎的写实小说家查里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生前居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住过的地区。而他著名的小说 *Oliver Twist* (1838)，也是以霍尔本区的贫民窟为背景。孙中山旅居在狄更斯居住过的同一个区。准此，1897年5月的图片，就以狄更斯的故居开始。笔者早年在香港的九龙华仁书院念中学时，已於英国文学的课程中，详细阅读过狄更斯的小说。但是，为了让自己尽量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sup>147</sup>笔者又到图书馆，把狄更斯的小说有系统地全部重读，别有一番感受！

第四章分析孙中山旅英期间的著作、佚文、谈话等。目的是探索在这个时期，孙中山构思三民主义情况的蛛丝马迹。到目前为止，笔者已找到26件这样的文献，有些是各式《全集》未录者。

第五、六、七章，把散布在第二、三、四章中（该三章是以时间先后排日志、图篆和著作、佚文、谈话的），有关三民主义的材料集中起来，分门别类地按民生、民权、民族等，分别用三章的篇幅进行分析、探索。同时，结合当时伦敦的“大气候”，“大环境”，进行考察。所谓“大气候”，包括当时英国的政治和社会气候。例如，英国的工人运动，方兴未艾，当时的《泰晤士报》对于劳资纠纷，天天都有报导；而跟踪孙中山的侦探，又差不多每天都报告他买了报纸阅读。所谓“大环境”，包括当时孙中山居住和活动的地方和周遭环境。例如，从孙中山寄居的葛雷法学院坊走不出几条街道，就是贫民窟，与高贵的法学院成了强烈的对照。虽然没有一条史料具体地说过，孙中山某天去了贫民窟。但是，侦探跟踪孙中山，说他某天从寓所出来，沿什么街道，徒步走过什么地方，到达什么目的地，笔者再依样葫芦地走一走，就心里了然。笔者也曾在孙中山寄居过的地区团团转了30个寒暑（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旧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址，就在葛雷法学院坊附近)，<sup>148</sup>因而对附近的大街小巷很熟悉。尽管这些贫民窟现在都已被拆掉了。这三章的最终目的，是要砌出一幅内容比较踏实的图案，让读者也去“神游冥想”，追寻三民主义的渊源。

第八章总结经验，以本书为例，谈谈“神游冥想”对重建历史的功能，以及其重要性与局限性。

## 八 本书定位

笔者不是第一个试图设法追寻三民主义渊源的人。过去，广州市中山大学的陈锡祺教授，就曾对这个问题作过首创性的探讨。他写道：“孙中山留住伦敦的第二年（1897），伦敦的机器制造工人，因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宣布罢工遭到企业家们的残酷打击。”<sup>149</sup>这段话对笔者产生很大的启发，故首先追阅陈教授用过的史料：苏联人编的《近代史教程》汉译本。该教程没有列出所引用过的原始史料。接着笔者查阅英国方面的有关著述，发觉所谓机器制造工人的罢工，其实就是著名的1897年“工程师吃闭门羹事件”（Engineering Lock-out）。该事件在当年7月才在伦敦开始。<sup>150</sup>而孙中山早在6月30日已离开伦敦，翌日更从利物浦坐船离开了英国，所以谈不上耳闻目见。

陈锡祺教授又写道：“在同一年內……北威尔斯有石板制造工人罢工。”<sup>151</sup>所据同样是苏联人所编的《近代史教程》。笔者查阅《泰晤士报》，可知当时的确有所谓石板制造工人（slate workers）罢工，地点仅仅是彭林（Penrhyn）这个地方，而不是整个北威尔斯。罢工开始于1896年12月，当时孙中山已到了英国。罢工直到孙中山离开英国时还没结束。所以时间是吻合了。但是，罢工的原因，不是如苏联人所说的工人们生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活艰苦。工人们的工资与生活条件是挺不错的。罢工的原因是因为彭林勋爵（Lord Penrhyn）认为，工人们所选出来的代表他们谈判的委员会，没有资格与他谈判。<sup>152</sup>因此，这不是民生的问题，而是成立工会的民权问题。

吴相湘教授对孙中山的伦敦见闻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也作过探讨。但所据乃陈锡祺教授的书。<sup>153</sup>其实，在言论自由的伦敦报界，每一起工业纠纷都得到充分报导。机器制造工人、石板工人等罢工，还有那马车夫罢工，在伦敦人眼中，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孙中山正是天天见闻到大大小小的罢工，才决意构思其民生主义。

1979年，当笔者准备步陈、吴两位前辈后尘而作同样尝试时，陈锡祺教授及其他先进就好意提示笔者说，孙中山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非常用功地看书，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大多数从那儿来。他们建议笔者去追查。吴相湘教授似乎早想到这一点，所以也曾自费放舟英伦，亲自到大英博物馆调查，但收获不大，只能按照现存文献点滴，推测孙中山“自然”看过马克思、亨利乔治、克罗泡特金（Peter Alekseevich Kropotkin, 1847—1921）等人的著作。<sup>154</sup>笔者不愿就此罢休，同样到大英博物馆调查。承该馆领导面告，所有借书条子，在读者还书以后，即马上抛废纸箱。他又说，如果把所有借书条子都收藏起来的话，则再建几栋大英博物馆也藏不下。

尤记1975年，笔者作为澳大利亚、新州华裔学人协会的成员，曾应中国科学院邀请访华。在上海参观孙中山故居时，就注意到玻璃书橱里有藏书。愿闻其详时，则发觉其他团员已露不耐，只好暂时作罢。以后总祈旧地重游，以便考察藏书。惜笔者有几个研究项目同时进行，<sup>155</sup>分身乏术。现重拾旧梦，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已两鬓如霜。欣悉复旦大学的姜义华教授，已为该等藏书中有有关政治理论的部分作疏记。<sup>156</sup>拜读之下，窃以为其中1897年或以前出版的书籍，很有可能是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阅读过以后，印象深刻，觉得有珍藏价值，于是购置作座右。这些书载有孙中山“用红蓝铅笔画下横线、问号、圈、叉等各种记号”，<sup>157</sup>可见重视程度。笔者把同名的书籍从敝校图书馆借来慢慢咀嚼，细细思量。有些更是笔者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早已看过的基础读物。现在用新的眼光重温，感受又沉了一层。而对孙中山当时的认识水平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把学者们强调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借书的条子这件事情，结合笔者对孙中山在1896年10月3日曾到水晶宫参观全英水果展览的推测，<sup>158</sup>让笔者联想到另一个关键问题。为了集思广益，笔者曾把孙中山参观水晶宫水果展览这个推论，献诸1994年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sup>159</sup>评论人不以为然。他认为水果，“属于学理的，往往可见诸书本中，属于现实的，可以见诸报刊中”，孙中山不必花那么大的劲跑到水晶宫去观看各种水果。<sup>160</sup>笔者聆受教益之余，再经过多年反复思考，还是不敢苟同。理由有三。第一，综观孙中山毕生行事，可知他是个行动家而不是个书呆子。跑到水晶宫，搞清楚各种水果的庐山真面目；买几种来亲手观摩观摩；咬几口尝尝其味道；与华南著名的荔枝、龙眼、黄皮等比较比较；跟果农聊聊栽果苦乐，包括气候、晴雨、土壤、施肥、害虫、水果的脾气等等，显然跟光是读书看报，有天渊之别。第二，他后来更撰文提倡“行易知难”之说，<sup>161</sup>可见他深信“真知”不能光靠书本的道理。孟子也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sup>162</sup>其理相同。第三，如果孙中山惯于光靠书本，而不去考察实际，后来他就不会相继去参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观全英圣诞育肥家畜展览、全英自行车展览、约翰王签署大宪章蜡像展览、工艺馆里的展览等等。<sup>163</sup>他之参观水果展览，与参观其他展览，行动是一致的。与他重视农功也是一致的。

很多读书人，得悉孙中山曾在大英博物馆看书以后，就断定他的三民主义，像马克思的理论，都是从大英博物馆的藏书得来的。其实，马克思的理论，何尝不是光从书本上得来的？他长时间生活在英国工业重镇曼彻斯特，目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的惨状，再结合书本上的知识，经过思考，升华为理论，成不世之言。同样地，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看书所得到的知识固然重要，但绝对不能漠视他在伦敦生活时天天“所见所闻”<sup>164</sup>而取得的现实经验。他在大英博物馆借书的条子再也找不到了，倒是他每天的生活情况，大致还有蛛丝马迹可寻。而这些蛛丝马迹，正是现存史料、文物等所容许本书着力的地方。二者缺其一（鉴于上海故居藏书的发现，虽不能说另一全缺，但总不比“日志”之较全），属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这是本书的长处与不足的地方。

倒过来说，如果只有孙中山的借书条子，而没法编就他的活动“日志”，笔者反而更不放心。笔者曾按照侦探报告而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孙中山到大英博物馆看书的日子，一共只有68天。即孙中山留英九个月，我们能肯定地说他在大英博物馆看书的日子，只有两个月零八天。其中最短的一天，停留了只有一个小时。最长的一天，停留了7小时25分（也只有这一天停留了这么长时间）。其他日子，停留时间约在3—6小时之间。如果说，平均每天停留5个小时，68天共340个小时，能看多少书？不错，1897年4月23日到6月9日（共48天）的侦探报告全缺。假设在这48天当中，孙中山天天都在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大英博物馆看书5个小时，则68天加48天共580个小时，能看多少书？但是，这个假设是很难成立的。试想，七个半月才去了大英博物馆68天，怎么会在其余的一个半月就去了48天？孙中山还有其他活动！同时，他阅读的速度有多快？吸收的能力有多强？在影响他看书的数量。考虑到这种种因素，笔者有一种依稀感觉，即孙中山在大英博物馆里用心看过的有关政治理论的书，很可能就是上海孙中山故居所藏的1897年和之前出版的那几本。笔者必须强调，这只是一种感觉，而且是依稀的感觉，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总的来说，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说过的，主要是他的“所见所闻”，而不是他在大英博物馆看过的书，促成他“三民主义之所由完成”。<sup>165</sup>

笔者希望在陈锡祺教授和吴相湘教授两位老前辈艰苦耕耘<sup>166</sup>所取得的成果上，再加点滴。笔者更希望在搜集和联想史料以及重建历史的过程中，具体演绎“神游冥想”作为一种史学方法的重要性。故著是书，仁候贤达指正。

## 注释：

- 1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载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第1册第412页。以后简称《国父全集》（1989）。
- 2 C. Martin Wilbur,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23—192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
- 3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p. 39.
- 4 Mary C. Wright, 'The Rising Tide of Change', in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 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3.
- 5 John King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4th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460—1.
  - 6 《国父全集》第1册第412页。
  - 7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247页。
  - 8 这是他在牛津大学退休演说会上所说的话,可以说是总结了他一生教研历史的经验。演讲全文刊 Hugh Trevor-Roper, *History and Imagin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 9 Slater to Macartney, 12 October 1896, 载罗家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南京:京华印书馆,1935)第115页。以后简称《蒙难史料》。
  - 10 Sun Yatsen's statement at the Treasury, 4 November 1896, para. 4, FO17/1718/p. 119. This is corroborated by Dr Cantlie's statement at the Treasury, 4 November 1896, para. 3, FO17/1718/p. 121.
  - 11 见第二章“日志”1896年10月1日的分析。
  - 12 见第三章“图策”1896年10月1日的有关地图。
  - 13 见第三章“图策”1896年10月1日的有关地图。
  - 14 Demetrius C. Boulger, *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K. C. M. G.* (London: John Lane, 1908), pp. ix-x, 286. 同时见郭廷以:《郭嵩焘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第2册第694页。
  - 15 Dr Cantlie's statement at the Treasury, 4 November 1896, para. 3, FO17/1718/p. 121.
  - 16 公使馆的人员邓廷铿,曾对被幽禁的孙中山说,如果不能把孙中山偷运回国的话,将会在公使馆内把他就地正法。见 Sun Yatsen's statement at the Treasury, 4 Nov 1896, para. 13, F. O. 17/1718/pp. 119—120.
  - 17 Mrs Cantlie's diary, 4 October 1896.
  - 18 Mrs Cantlie's diary, 20 October 1896.
  - 19 当时康德黎医生的大儿子克夫(Keith)10岁。次子柯林(Colin)8岁。三子倪理(Neil)4岁。
  - 20 笔者在1983年5月21日星期六去拜访他时,他已经是75岁的老人。不久就去世。
  - 21 据笔者1983年5月21日拜见纳夫·康德黎上校的笔记(In my own bound research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 notes 'Sun Yat-sen, May 1983', pp. 184—9).
- 22 Dr Cantlie's statement at the Treasury, 4 November 1896, para. 5, FO17/1718/p. 121.
- 23 Slater's report, 6 October 1896, 载罗家伦:《蒙难史料》第 114 页。
- 24 Manson's statement at the Treasury, 4 November 1896, paras. 2—3, FO17/1718/p. 122.
- 25 Cantlie's statement at the Treasury, 4 November 1896, para. 5, FO17/1718/p. 121.
- 26 承 Austin Coates 先生相告, 特致谢忱。见 Coates to Wong, 4 September 1987, in my own bound research notes 'Research Notes on Sun Yatsen, Feb 1986—Jan 1988', pp. 191—3.
- 27 见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民生主义教育的几个部门》, 载《国父全集》(1989)第 1 册第 204—214 页。
- 28 Slater's report, 23—28 October 1896, 载《蒙难史料》第 123 页。
- 29 记者的话。见 Sun, 24 October 1896, p. 3, col. 1.
- 30 龚照璠致杨儒密电, 1896 年 10 月 10 日, 载《蒙难史料》第 25—26 页。杨儒乃清朝驻美公使。
- 31 载《国父全集》第 1 册第 412 页。
- 32 Slater to Macartney, 12 October 1896, 载《蒙难史料》第 118 页。
- 33 Tomlin to Wong, 20 April 1983, Senate of the Inns of Court and the Bar, A452, in my own bound research notes 'Sun Yat-sen, 1979—83', pp. 137—8.
- 34 Kelly's London Post Office Directory (1987), p. 267. 该《便览》称税氏酒馆为 Shades Tavern.
- 35 Kelly's London Post Office Directory (1987), p. 267.
- 36 D. W. Lee to Wong, 23 November 1983, Information Services Ltd., DWL/SCR, in my own bound research notes 'Sun Yat-sen, Jun 1983 - Feb 1984', pp. 149—50.
- 37 Robert Elwall to Wong, 19 March 1984, received on 28 June 1984, in my own bound research notes 'Sun Yat-sen, Jun-Dec 1984', p. 184ff.
- 38 2001 年夏, 笔者再访伦敦时, 旧地重游, 则该酒馆的名字又略为 Old Shades.
- 39 London County Council (ed.), *Names and Plac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County of London* (London: London County Council, 1955), p. 851 'Names abolished since 1 August 1929 with present names'. Its new address is 37 Whitehall.
- 40 Slater to Macartney, 12 October 1896, 载《蒙难史料考》第 111 页。
- 41 事后笔者写信感谢他。见 Wong to W. K. Calveley, 27 June 1984, in my own bound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 research notes 'Sun Yatsen, Jun-Dec, 1984', p. 81.
- 42 Slater to Macartney, 12 October 1896, 载《蒙难史料》第 111 页。
- 43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 1982)上册第 151 页。
- 44 Janet Smith to Wong, 3 March 1983, in my own bound research notes 'Sun Yat-sen, 1979—83', p. 103.
- 45 Slater to Macartney, 12 October 1896, 载《蒙难史料》第 111 页。
- 46 Janet Smith to Wong, 3 March 1983, in my own bound research notes 'Sun Yat-sen, 1979—83', p. 103.
- 47 J. Gordon Read to Wong, 23 May 1983, in my own bound research notes 'Sun Yat-sen, Jun 1983 - Feb 1984', pp. 178—9.
- 48 Charles Klapper, *The Golden Age of Tramway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1), p. 84. 由于这种交通工具很快就被更先进的交通工具所代替(同上, 第 87 页), 所以这种流行一时的土语, 很快又从利物浦人的日常词汇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以致现代利物浦的学人, 对这怪词也懵然不知。
- 49 *Queens London* (London: Cassell: 1902), p. 17.
- 50 例如吴相湘教授就把它翻译成格雷旅舍。见其《孙逸仙先生传》第 1 册第 152 页。吴相湘教授自费研究, 无法在伦敦多所停留, 可知老一辈的学者做学问功夫的艰苦。
- 51 格雷法学院坊, 位于该学院外围的西边, 并以该学院命名, 但与该学院毫无关系。
- 52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第 1 册第 152 页。
- 53 *Queen's London*, p. 189.
- 54 英裔的美国人采 Circus 而采 Circle(圆圈), 其意相同。
- 55 时至今天, 在该处的交通同样不回旋, 固仍应称为十字路口。
- 56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47 页。
- 57 余英时:《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 香港《明报月刊》, 总 322 期(1992 年第十期), 第 28—35 页中之 29 页。
- 58 Mrs Cantlie's diary, 4 October 1896.
- 59 录取证词时, 是一问一答。之后去问留答, 连起来一气呵成叫证词。但从上文下理中, 仍可以看出, 问话者打断作证者的地方。
- 60 Cantlie's statement at the Treasury, 4 November 1896, para. 4, FO17/1718/p. 121.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 61 Neil Cantlie and George Seaver, *Sir James Cantlie: A Romance in Medicine* (London: John Murray, 1930), p. 101.
- 62 笔者 1968 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念博士, 1971 年留校当博士后。1974 年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任教, 此后的差不多 30 年以来, 几乎每年的暑假都回英国研究三个月, 有时候寒假也回去, 1979—1980 年度更应邀到剑桥大学当客座研究员一年。
- 63 以现代的习惯, Presbyterian Church 一般翻译作长老会。在孙中山时代的香港, 被翻译作道济会, 可说甚具时代特色。
- 64 2001 年 6 月 30 日笔者路过香港时, 与龙炳颐教授一席话。龙教授本人属道济会, 深谙该会口碑。
- 65 Mrs Cantlie's diary, 18 October 1896.
- 66 John Davy, *Parish Work in St. Martin-in-the-Fields*, n. d.
- 67 感谢敝系退休老教授 Ken Cable 博士相告。Cable 博士, 毕生研究英国圣公会的历史与礼仪, 是这方面的权威。
- 68 *The Times*, 5 October 1896, p. 6, cols. 5—6.
- 69 英语原文是 'China's Present and Future: The Reform Party's Plea for British Benevolent Neutrality', *Fortnightly Review* (New series), v. 61, no. 363 (March 1, 1897), pp. 424-440. 汉语译本见《国父全集》第 2 册第 223—236 页。
- 70 英语原文是 'Judicial Reform in China', *East Asia*, v. 1, no. 1 (Jul 1897), pp. 3—13. 汉语译本见本书第四章。
- 71 *The Times*, 23 September 1896, p. 5, col. 3.
- 72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 载《国父全集》第 1 册第 412 页。
- 73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47 页。
- 74 余英时:《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香港《明报月刊》,总 322 期(1992 年第十期),第 28—35 页中之 29 页。
- 75 罗久蓉评拙著《孙中山伦敦蒙难真相》(台北:联经, 1998), 载台北《中国时报》1998 年 12 月 3 日《开卷版, 好书榜》。
- 76 这是笔者对罗博士覆函的理解。见罗久蓉覆黄宇和函, 2001 年 5 月 8 日; 暨黄宇和再函罗久蓉, 2001 年 7 月 1 日。
- 77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 载《国父全集》第 1 册第 412 页。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 78 载《国父全集》第2册第193—223、198页。
- 79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137n. 127.
- 80 Slater's report, 1 October 1896, 载《蒙难史料》第110—111页。
- 81 杨儒致龚照璠密电, 1896年9月23日, 载《蒙难史料》第16—17页。
- 82 Slater's report, 1 October 1896, 载《蒙难史料》第110—111页。
- 83 *Liverpool Echo*, 30 September 1896, p. 3, col. 4.
- 84 详见拙著 *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Sun Yatsen in London, 1896—189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85—8 及《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 从未披露的史实》(台北: 联经, 1998)第四章。
- 85 Cantlie's statement at the Treasury, 4 November 1896, para. 2, FO17/1718/p. 121—2.
- 86 Slater's report, 11—24 July 1897, 载《蒙难史料》第166页。
- 87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137n. 127.
- 88 Slater's report, 11—24 July 1897, 载《蒙难史料》第166页。Numidia 乃古地名, 面积包括今天的屯尼系亚(Tunisia)暨非洲东北部。过去该地的君主, 是罗马帝国的盟友。该地的居民就叫 Numidian。
- 89 Jean Cantlie Stuart, *The Quality of Mercy: The Lives fo Sir James and Lady Cantli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3), p. 95.
- 90 *Liverpool Mercury*, 1 July 1897, 启碇栏。
- 91 Slater's report, 11—24 July 1897, 载《蒙难史料》第166页。
- 92 *Liverpool Mercury*, 2 July 1897, 已启碇栏。
- 93 Mrs Cantlie's diary, 30 June 1897.
- 94 南方熊楠日记, 1897年6月30日。载《南方熊楠全集》(东京, 1975), 别卷2第92页。
- 95 Slater's report, 30 September 1896, 载《蒙难史料》第111页。
- 96 *Globe*, 30 June 1897, p. 3 col. 6。该信的译文见第四章。
- 97 南方熊楠日记, 1897年5月8、24、26日。载《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第74、87等页。
- 98 在这个问题上, 笔者到了1986年为止, 已收集到足够的资料, 下了一个初步结论。详见拙著 *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Sun Yatsen in London, 1896—189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暨拙文《孙中山第一次伦敦的时间和空间的考订》,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2298—2303页。再经过15个寒暑继续努力探索与思考，笔者在这儿写下了更为肯定的推论。

- 99 见本书第二章“日志”。
- 100 Slater's reports, 17 March 1897 and 25 March 1897, 载《蒙难史料》第149—150、152页。
- 101 Slater's report, 6 October 1896, 载《蒙难史料》第114页。
- 102 见第二章“日志”。
- 103 见第二章“日志”。
- 104 Slater's report, 12 October 1896, 载《蒙难史料》第115页。
- 105 *The Times*, 12 October 1896, p. 6, col. 2.
- 106 见第二章“日志”。
- 107 Slater's report, 21 November 1896, 载《蒙难史料》第123页。
- 108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186页。
- 109 *Records of the Honourable Society of Lincoln's Inn: The Black Books*, v. 5, A. D. 1845 - A. D. 1914, p. xxxvii.
- 110 见拙著 *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pp. 185—193.
- 111 其中的 Boothe Papers.
- 112 编号是 BL Add. MS 39168/138—141.
- 113 南方熊楠日记，1897年6月27日。载南方熊楠：《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第92页。
- 114 见拙文《英国对华炮舰政策剖析》，《近代史研究》，总112期（1999年7月），第1—43页。
- 115 James Morris, *Pax Britannica: The Climax of an Empi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8), p. 21.
- 116 *The Times*, 28 June 1897, p. 11, cols. 2—3.
- 117 James Morris, *Pax Britannica: The Climax of an Empire*, p. 22.
- 118 James Morris, *Pax Britannica: The Climax of an Empire*, p. 22.
- 119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80), p. 155.
- 120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载《国父全集》第1册第421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 页。
- 121 ' [A] ll classes [were] drunk with sightseeing and hysterical loyalty'. Quoted in James Morris, *Pax Britannica: The Climax of an Empi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8), p. 26.
- 122 Stephanie Po-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25* (London: MacMillan, 1998), pp. 118—9.
- 123 李玉贞:《孙中山外交政策给后人的启迪——“中德俄联盟”与“民族国际”》,载张磊、王杰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下册第609—624页。
- 124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国父全集》第1册第3页。
- 125 关于商团事件,笔者将在拙著《孙中山与英国》一书中,作进一步交代。在此仅说,喜见中国大陆学者也开始使用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原始文献;并在确凿史料面前,毅然挑战成见:诚民族之福!见张俊义《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48—64页。
- 126 Slater's report, 6 October 1896, 载《蒙难史料》第137页。
- 127 *The Times*, 13 January 1897, p. 1, col. 5.
- 128 Slater's report, 6 October 1896, 载《蒙难史料》第114页。
- 129 Sun's statement at the Treasury, 4 November 1896, para. 5—6, FO17/1718/p. 119.
- 130 见本书第二章“日志”。
- 131 载《国父全集》第2册第189—191页。
- 132 载《国父全集》第4册第1—3页。
- 133 载《国父全集》第4册第3—11页。
- 134 载《国父全集》第4册第11—13页。
- 135 见本书第二章“日志”。
- 136 孙中山居住在伦敦市中心。他如果要参观水晶宫的话,必须坐火车去,而且必须在水晶宫停留一整天才值得。
- 137 在康德黎家的附近,就有著名的皇后大礼堂(Queen's Hall),那里经常举行音乐会,后来孙中山也去参观了(本书第二章“日志”)。
- 138 *The Times*, 2 October 1896, p. 1, col. 3.
- 139 见本书第二章“日志”。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 140 Slater's report, 6 October 1896, 载《蒙难史料》第 113—114 页。
- 141 为了集思广益,笔者曾把这个推论,献诸 1994 年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评论人吕实强教授不以为然。笔者对这分歧的分析,见本章第八节‘本书定位’最后部分。
- 142 载《国父全集》第 1 册第 412 页。
- 143 J. Ellis Barker to H. H. Asquith, 13 Octobr 1991, FO371/1093, p. 236.
- 144 笔者有幸,在 1960 年代后期和 1970 年代初期,承英国国家档案馆助理馆长 (Principal Assistant Keeper),白马俱乐部 (White Horse Club) 的会员,泰明士先生 (Mr Kenneth Timings) 多次邀请到该俱乐部午膳和参观。1970 年代中期,承马来亚殖民政府前华民政务司司长、英联邦俱乐部的会员白拉夫先生 (Mr Wilfred Blythe), 多次邀请到该俱乐部午膳和参观。1980 年代则承康德黎医生的孙女,热文诗阁俱乐部 (Lansdowne Club) 的会员,史貂沃女士 (Mrs Jean Cantlie Stewart), 到该俱乐部午膳及参观。2000 年代,又承剑桥大学的比利教授 (Professor Christopher A. Bayly), 政改俱乐部 (Reform Club) 的会员,多次邀请到该俱乐部晚膳和参观。像宪法俱乐部一样,政改俱乐部的古今会员包括英国历代政要,位置也在特拉法加广场 (Trafalgar Square) 附近 (东南角)。随着大英帝国的扩张,这种特权阶级的产物也传到世界各地。新加坡的热拂斯俱乐部 (Raffles Club)——承新加坡工业法庭主席陈文章大法官邀请;香港的赛马会 (Hong Kong Jockey Club)——承旧同窗刘汉泉先生邀请;澳大利亚悉尼市的塔塔素斯俱乐部 (Tattersall's Club)——承盎鲁博士 (Dr Jim Angel) 邀请;均让笔者大开眼界。
- 145 He is not listed in Britain's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r *Who's Who*. However, a certain Sir John Barker is listed in *Who's Who of British Members of Parliament: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based on annual volumes of 'Dod's Parliamentary Companion' and other sources, Four vs, edited by Michael Stenton and Stephen Lees (Hassocks,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76), v. 2, p. 21*. It is plausible that this Sir John Barker is the same person as J. Ellis Barker, as that initial J. may stand for John and some people do change their preferred Christian name when knighted, witness similar changes in the *British Foreign Office List*.
- 146 笔者用上“似乎是”等字眼,是因为不敢绝对肯定。希望在本书定稿时,能找到多一点头绪。不然的话,就留待下回分解。再不然的话,就留待后人去进一步

## 三民主义伦敦探源

考证。

- 147 *Who's Who of British Members of Parliament*, v. 2, p. 21.
- 148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47 页。
- 149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 247 页。
- 150 有关笔者与英国国家档案馆旧址(Public Record Office, Chancery Lane, London)的渊源，见拙文《全球一体化旋风中的近代中国：从叶名琛档案谈起》。该文曾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0 年 9 月在北京举行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讨论，并将会被收进该所所编的论文集。
- 151 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第二版)第 44 页。
- 152 H. A. Clegg, Alan Fox and A. F. Thompson, *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Unions since 1889*, v. 1, 1889—191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63.
- 153 陈锡祺：《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第 44 页。
- 154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 200—204 页。
- 155 该等项目先后出版如下：*Yeh Ming-ch' en: Viceroy of Liang-Kuang, 1852—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Anglo-Chinese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两广总督叶名琛》(北京：中华书局，1984)；*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Deadly Drea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两次鸦片战争与香港的个让》(台北：国史馆，1998)；《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台北：联经，1998)。
- 156 姜义华：《民权主义思想溯源——上海孙中山故居部分藏书疏记》，载姜义华：《大道之行也——孙中山思想发微》(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 108—123 页。
- 157 同上，第 122 页。
- 158 见本章第七节有关‘日志’取材于报章的部分。
- 159 见拙文《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探索》，载《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第 1 册第 70—93 页。
- 160 同上，第 101 页，吕实强教授的评论。
- 161 见载《国父全集》第 1 册第 355 页。
- 162 见孟子：《尽心篇》下第 3 章。
- 163 见本书第二章‘日志’。

### 三民主义伦教探源

- 164 载《国父全集》第1册第412页。
- 165 载《国父全集》第1册第412页。
- 166 陈锡祺教授在撰写其大作时，史料严重缺乏，以致研究孙中山也只能取材于苏联人所编的《近代史教程》汉译本，苦心孤诣，可见一斑。至于吴相湘教授，则适逢当时台湾“白色恐怖”，以致“愤而辞去台湾大学教职，二十余年来，未任公职、取国库分文，自无退休金，生活都依赖儿女，尤其购书、影印各费极多，也是儿女供给。而所处的物质精神环境都是冷酷无情。”（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册自序第12页），艰苦可知。

（作者 黄宇和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